



即使没有人类自身有效的干预与防护，**瘟疫的破坏性也是限定在一个边界内的，并不会无限度地扩张。**



阻抗力量之间的对比，而至少在出现了以天花接种为起点的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的1700年之前，疫病所代表的自然力量在形塑历史关系上的作用是很难被人为力量抵消的。事实上，只是到了1900年前后，依靠近代医学成就，城市人口才第一次在不仰赖农村移民的前提下自我维持。而在此之前，城市作为文明病的渊藪，不仅要求农村为其生产剩余的粮食，而且要求生产剩余的人口。

在公共卫生方面，比城市更凶险的是战场。战场不但集结了城市规模的人口，而且形成了传染病交锋的前沿，因此，20世纪之前的战争，病毒的进攻较之敌人的进攻通常更具杀伤力。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军死于痢疾的人数是死于俄罗斯炮火的10倍，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英军病亡人数5倍于阵亡。然而，仅2年后，日本人就向世界证明了，强制的疫苗注射可以取得怎样的成功：他们在日俄战争（1904-1906年）中死于疾病的人数不及阵亡的1/4。公共卫生制度在军队中的确立，使一战时几百万人麇集法国北部战壕的空前壮举在医学上成为可能。

## 更多的精力，应用于对付现实的病魔

结合今天武汉的疫情，我想从《瘟疫与人》中梳理出这样

传教士拍摄的晚清老照片：麻风病村里气氛压抑。



几点：

一、瘟疫是人类对手、角力者，但不是敌人。病毒在展示自我存在时产生的对人类宿主的伤害本质上带有误伤的性质，因为完全消灭了人类宿主，传染病也就消失了。因此，即便出于自保，病毒也会透过试错过程逐渐调整到能够与人类宿主建立起某种共生关系，也就是最终稳定为地方病或儿童病这种“文明病”形态。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人类自身有效的干预与防护，瘟疫的破坏性也是限定在一个边界内的，并不会无限度地扩张。这个结论可以成为《瘟疫与人》给予我们的最底线的安慰，尽管是底线的，但也是一种安慰。

二、人类也不能追求让传染病从人类历史中彻底消失这种不可能达到的目标。首先，人类对于自然界本身就是一场无所不在的瘟疫，他屠戮生灵，毁坏生态，无限度地扩张自己的食物范畴。其次，我们可以杀死特定病人身上的病毒，但不可能杀死病毒本身。所有出现在历史上的病毒都不是被人类杀死的，而是在人类体内激发出抗体之后，稳定下来，直到它越出了原来的地理疆域，在新的地盘上再度肆虐；或者直到它变异出了新的形态，在旧有的疆域内再一次重复上一个由发病到产生抗体的过程。最后，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没有瘟疫的世界，就像没有战争的世界一样，其实是不严肃的。瘟疫与战争一样，迫使人们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集体地体验生命边界处的生存，触

西班牙流感。

